

airiti

南南合作或南向掠奪？ 解釋東協國家對中資南進的不信任

黃韋豪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簡稱FDI)大幅湧入世界各國後,被投資國對於中國資金的質疑與恐懼也逐漸浮現,例如:歐洲各國擔憂中資入主後,將降低歐陸勞工的待遇;澳洲民眾與國會反對中資併購國內農場等。然而,上述恐慌卻與文獻資料分析存有歧異,爬梳有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之於被投資國的影響等相關研究後發現,中國資金並未帶來「紅色政治」,且中資與其他國家投資的運作方式亦無明顯差異。雖然中資並未對被投資國產生預期的傷害和損失,但為什麼仍可觀察到世界各國對中國資金的不信任及存疑的現象呢?

本文提出政治體制差異的假說,用以解釋各國對中資的不信任。由於政治體制的根本差異,民主程度較高的國家較容易對於來自非民主國家的資金產生不信任感與懷疑,也因此會觀察到上述若干抗議與質疑的情形。在中國一帶一路的官方投資方向下,東南亞各國皆為中國的重點投資對象,故本文將以印度尼西亞與泰國進行個案研究:以中資於印尼與泰國皆占有重要比率為前提,分析不同政治體制對於中資管制的差異,來驗證所提出的假說,並解釋為什麼各國會對中資產生恐慌與偏見。

關鍵詞：中國對外投資、政體差異、投資管制、民間回應、東協國家

* * *

壹、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與其對外投資

近年來，隨著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崛起，中國和其外交政策已是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的討論焦點，透過分析此崛起中強權的外交政策與政府決策，學者們對於中國將帶來互利共生的新國際局勢，抑或是新一代冷戰的態勢並無定論：首先，部分學者從貿易互賴等自由主義角度出發，認為中國受益於當今由自由主義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國在考量自身利益之後，和平崛起的可能性較高（例如：Kang 2007; Weede 2010; Beeson and Li 2012; Xiang, Primiano and Huang 2015）；然而主張攻勢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理論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因為美中權力的轉變，導致國際局勢的不穩定，並提高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例如：Efird, Kugler and Genna 2003; Lemke and Tammen 2003; Rapkin and Thompson 2003; Mearsheimer 2006; Beeson 2009）。上述研究的解釋變項大多關注於中國外交政策的使用頻率（如：有無使用武力¹）或決策模式（如：成本效益分析²）。其次，美國³與其他國家⁴將採取哪些行動以面對

¹ 例如Xiang, Primiano and Huang (2015)以軍事化國際衝突(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MIDs)為依變數討論中國是否和平崛起一案。

² 例如Fravel(2005; 2008)以中國政府在領土爭端的成本效益考量，解釋中國在領土爭端上的策略與選擇。

³ 就美國而言，學者就整體戰略上分別提出圍交(containment)策略(例如Segal 1996; Brooks, Ikenberry, and Wohlforth 2012; Blackwill and Tellis 2015)和遏制(restrain)策略(例如Craig et al. 2013; Posen 2014; Glaser 2015)等兩種面對崛起中國的外交戰略。就軟權力(soft power)方面，Huang, Lien, and Xiang(2019)則提出以孔子學院作為觀察基準分析美國對中國崛起軟權力的因應政策。

⁴ 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其他國家在面對強國間權力交替的政策研究大略可分為抗衡(balancing)、扈從(bandwagoning)與避險(hedging)三種策略，抗衡策略是以現實主義的論點出發，認為鄰近諸國會為了避免區域霸權的出現而團結圍堵對抗新興強權國家，相關討論詳見Ross 2006; Friedberg 2011; Acharya 2014。支持扈從策略的學者則認為基於中國過去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鄰近諸國反而可以傾向於依附於中國提出的新興區域秩序和體系，相關討論詳見Kang(2003; 2004)。最後，避險策略是近年來亞洲學者提出的第三個選擇，意即著重於小國對大國的策略選擇，藉此以避免

中國的崛起，也是另一個重要的切入面向，但是歷來探討各國——特別是夾在美中等強權間的中、小型國家——回應中國外交政策的實證研究稍顯不足，所以本文將以位於中國周邊的東南亞各國對於中國政策之回應為分析客體，以期在中國崛起的框架下，對區域安全與穩定之文獻與分析有所貢獻。

除了以東南亞各國的對中政策為主要研究方向，在議題方面，本文將從近年逐步受到關注，但是仍未於文獻中討論的經濟議題切入。相較於對中國安全政策的回應等討論，例如Kim and Park（2019）對南韓同意部屬薩德反飛彈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簡稱THAAD）的分析、Bitzinger（2018）對日本將出雲號護衛艦航母化等研究，針對中國挾其經濟實力對外投資，以及擴張對亞太地區影響的研究則略顯不足⁵。隨著中國政治與經濟實力的崛起，中國由已開發國家FDI的被投資國，轉為世界主要投資者之一。自2013年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便快速成長，於2017年已躍升為世界第六大 FDI 投資國，僅次於美國、荷蘭、日本、英國和德國等傳統已開發國家，2016 年中國對外投資額達2160億美金⁶，與改革開放後的 1982 年相較⁷，中國對外投資金額成長了兩千多倍；與中國對非洲FDI嶄露頭角的2008年相較，2016年的總量也成長了四倍之多⁸。在FDI總量的大幅成長外，北京政府也積極的倡導對外經濟「擴張」，在具體政策上，於2013年倡議一帶一路計劃（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簡稱BRI），另於2014年提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簡稱亞投行），此兩項政策的提出與實施，都再度顯示北京政府對於擴大對外投資的企圖與決心。

綜合上述研究方向與議題，相對於FDI文獻多從投資國主觀角度切入分

並分散因為抗衡和慮的選擇所導致的政治風險，相關討論詳見吳玉山（1997）；Kuik（2008；2016）。

⁵ 文獻上對於中國對外FDI的研究聚焦於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例如Cheung and Qian 2009；Alden, Large and Oliveira 2008；Cheung, de Haan, Qian and Yu 2012。

⁶ 中國的總對外FDI數據取自於（The World Bank 2019），於2019年6月10日進入，數值皆為以2010年美金針對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的現值美金。

⁷ 1982年為中國在世界銀行資料庫中最早有資料的一年，該年度的淨對外FDI（net outward FDI）總值約4400萬美金。

⁸ 2008年中國的淨對外FDI為567.42億美金。

析，「被投資國如何面對新興投資國的湧入資金」將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重點：中國南進對東南亞諸國的投資，從被投資國的角度看來，究竟是被解讀為互利共生、挹注開發資金的「南向合作」？抑或是和過去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一樣，被認為是資源掠奪與市場強占的「南向掠奪」？研究方法上，本文將透過最相近比較個案研究法（Most Similar Comparative Case Study），在排除了其他可能影響國內對於中國投資態度的因素後，以東協下的印度尼西亞與泰國為個案，探索性地提出可能理解各國對中國投資態度的指標，並提出政治體制差異的假說，粗淺地解釋東南亞諸國對中資不信任的原因，以作為補充既有文獻多僅以投資國的利弊動機進行分析。

在這探索性指標之建構過程中，本文期待能從兩方面補足FDI文獻之不足：一是探討被投資國對於外資的管制態度與回應方式，以提供中國於亞太地區投資的不同的分析方向；二則是探討東南亞各國如何主觀認知來自中國的投資，而非中國投資的利弊，這預期會對中國崛起與鄰近地區互動的文獻有所貢獻。以下將先概述中國FDI的特色、各國對中國FDI的解讀。

貳、研究問題與假說：分析各國對中國對外投資政策回應上之差異

一、各國對中國對外投資的回應

面對從中國湧入的新興資金，澳洲民衆、媒體與政府對中國投資感到不滿（Cogan 2015），甚至採取了積極的反制措施（Smith 2015; Smyth 2018）。首先，於房地產上，中資被澳洲媒體指控為房價飆高的兇手（Chazan 2017）；其次，於能源產業上，以中資對澳洲最大能源供應商Ausgrid的收購為例，澳洲財政部與外資審查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簡稱FIRB）皆建議該筆收購案很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目前已經暫緩該項投計畫的核准程序（BBC 2016）；最後，於農業上，中資被指控於2016到2017間大量買入農地，中資持有的澳洲農地從一千五百萬公頃暴增為一億四千萬公頃，取代英國成為第二大外資農地持有國，而中國在澳洲的農業投資，也從2014年1.4億

美元驟升為2015年3.75億美元（Laurenceson 2017），澳洲並非唯一反對中資取得國內農地的已開發國家，在法國也有相似的抗議與民間反彈（Thiessen 2018）。但中國在澳洲的投資真的帶來上述的負面結果嗎？部分學者與媒體對此提出質疑：在房地產議題上，Mona Chung指出中資於房地產的影響，在一瞬間被指控為元凶，而不去討論其他政府購屋或金融政策，導致澳洲民眾對於中資產生「入侵」的印象（Chung 2017）；在中資對其他產業的投資上，媒體也認為澳洲民眾與政府的反彈，是短視近利（Moss 2018），而原因可能是對於中國近年強勢外交作為的不信任與恐慌（Jennings 2018）。相同狀況也見於中國於金融危機後對歐盟各國的投資：媒體與民眾質疑中國之投資目的與動機，但另一方面根據Meunier（2014）的研究，卻顯示中國並未趁歐洲金融危機時，低價殺入及併購歐洲企業，且希臘和德國等國仍舊大舉歡迎中國投資。以德國為例，Meunier, Burgoon and Jacoby（2014）首先肯定華為等中資企業在德國的投資，替該國帶來穩定的就業機會和經濟貢獻，但是德國的太陽能企業（Pedroletti 2013）和近年的政府（Chazan 2016; Rasmussen 2017）則對中國投資抱有疑慮，前者要求歐盟處理中國傾銷的問題；後者則是逐步檢討和加強管制中資在德高科技產業的投資。

相較於上述中國對於已開發、高度民主化國家的投資，中資對於發展中國家並不陌生，但是卻有著不盡相同的回應方式。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是近年來中資為被投資國帶來「債務陷阱」的代表案例（BBC 2017），因為斯里蘭卡長期處於國內財政與國際收支（balance of payment）的不平衡，導致斯里蘭卡無法償還多筆來自中國總值數億美金的投資，最後以斯里蘭卡將漢班托塔港，以近百年為期租借給中國（Moramudali 2019），在此之前，斯里蘭卡民眾與政府並未對中國投資抱持疑惑或予以拒絕。馬來西亞是中國另外一個重要的開發中被投資國，而且多項中國投資更可對馬來西亞內政更具影響力（Jaipragas 2017），在2018年下議院大選前，不論是政治人物或是民眾，皆舉雙手歡迎中國投資，其中甚至包含要求檢討中國投資的現任總理馬哈地（Mahathir bin Mohamad）。相對於已開發各國，

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資料顯示⁹，斯里蘭卡與2018年前的馬來西亞¹⁰，皆屬於「部分自由（Partly Free）」的國家，特別是在媒體自由上，屬於「不自由（Not Free）」的類別。當然，並非所有開發中國家，都屬於民主化進行中的國家，菲律賓與印尼即為該地區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雖然印尼在總民主指標上，與馬來西亞和斯里蘭卡同屬於「部分自由」，但就新聞媒體的自由度上，則較另外兩國為佳，被評比為「部分自由」而非「不自由」，而印尼所具備的新聞自由與民主政體，也使該國對於中國投資——特別是在各種重要選舉期間——有著與馬來西亞和斯里蘭卡迥然不同的回應：在野黨紛紛以重新檢視中國在印尼的投資為訴求，並且獲得許多民衆的支持（Bayuni 2019）。

二、研究問題與假設

若綜合比較已開發與開發中各國對於中國投資的政策回應，可初步發現，就歐洲與澳洲而言，中資可能未對被投資國產生預期的傷害和損失（例如：在投資場域內，進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降低當地產業於勞工待遇與環境保護的標準，或是危害該國糧食供應與安全等議題），但是仍可觀察到各國對於中國投資具有強烈反彈，像是法國與澳洲對於中資採購國內農地的疑慮。若就成本及效益的考量來說，為什麼會在已開發國家間，觀察到民衆對於中資的反對與質疑？換句話說，在沒有經濟、社會等宣稱上的具體損失之虞，為什麼西方國家民衆會反對中資，甚至質疑與「不信任」來自中國的投資資金？本文將從這矛盾點出發，解釋各國對於中國對外投資態度及政策回應上的差異。為什麼有些國家願意接受來自威權中國的「紅色資金」，而其他國家則質疑與挑戰這些來自北京的「善意」？如果一個被投資國百般刁難、不信任中國投資，即便中國宣稱該投資是南向合作，從被投資國來說卻很可能是掠奪，是以本文將以分析東協國家對中資的「信任」，從被投資國的角度判斷中資南進是「南南

⁹ 分別詳見馬來西亞、斯里蘭卡與印尼各國的民主指標於Freedom House（2019）。

¹⁰ 在2018年馬來西亞第一次政黨輪替後，馬來西亞的媒體自由程度正逐步提升，有望於近年脫離媒體自由不自由的評比（Malaysiakini 2019）。

合作」還是「南向掠奪」？

上述各國對於中國資金的態度正呼應了一個新興的討論（例如：Börzel 2015; Tansey 2016; Yakouchyk 2019）：威權擴散（autocracy diffusion），甚至是促進威權（autocracy promotion）的理論，例如Yakouchyk（2019）便將威權政府對外促進其政權的方式分為主動與被動兩類，前者像是中國強力支持2019年大選後的委內瑞拉執政黨，後者則常通過經濟與外交合作支持其他威權政體，但是主要目的在於經濟活動與外交利益而非支持該政權繼續執政。而中國作為當今具有強大實力的威權政體，其外交行為自然是這方向討論的焦點，特別是因應中國經濟實力而生的對貿易關係與投資（例如：Chen and Kinzelback 2015; Bader 2015a; 2015b）。從這裡論理的發展，可以窺知各民主國家對於新興威權大國的作為與國際影響力感到擔憂。不僅如此，各國關於「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和近年提出的「銳實力」（Sharp power）的相關討論，更能進一步就中國的案例解釋各已開發民主國家對於「紅色資金」的不信任反應。

北京共識最早由Ramo（2004）提出，認為中國發展模式為樣板的威權政體和市場經濟結合的模式，可以作為取代建立在華盛頓共識上，由西方各國提出經濟發展模式。學者（例如：Thompson 2005; Kennedy 2010; Li, Brødsgaard and Jacobsen 2010）認為這發展模式，已經大大加強中國對外宣傳的力度與對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只是與此同時，這樣一個相異於過去主流的民主經濟發展模式概念的提出，也使得過去倡導民主經濟發展論的國家備感威脅，因而沒有對北京共識的影響有客觀的分析（例如：Ambrosio 2012; Chou, Pan and Poole 2017; Yakouchyk 2019）。例如在分析2008年到2012年媒體對於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的報導，Ambrosio（2012）發現報導的量受到特定國際事件的影響，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多數相關主題的報導並未深入討入個案，而僅以主觀的角度批判新興的威權經濟發展模式的可行與否。Chou, Pan and Poole（2017）在分析中國威權體制與軟權力對於澳洲民主運行時，認為將澳洲國內偏差的民主運行（democratic disengagement）咎責於中國的軟權力實則武斷且過度推論。從由銳實力的定義（Walker and Ludwig 2017; Walker 2018）也可以觀察到類似對威權政體不信任的意見，雖然Walker和Ludwig強調中國與俄羅

斯等威權國家利用民主政治的言論自由與開放社會，操縱性地散佈有利於自身利益之消息，但是作者並未明確說明哪些來自中俄的行為屬於瑞實力地運用而那些不是，換言之，幾乎中俄在民主國家內的所作所為都被粗糙的歸類為意圖侵害民主政治的手段。在綜合上述分析，更可以初步得知西方各國可能因為慣於過去自身主導的民主發展論與民主化理論，在面對威權國家的逆襲時，會因為過去的習慣而做出不信任與質疑的反應，這點與面對紅色資金時，澳洲和歐洲各國的反應相似。

在這理論之上，以開發中國家作為案例，可進一步提供可以解釋各國政策回應的資料變異量¹¹，即在不同的民主化程度下，開發中各國對於中國投資有著不同程度的回應與「信任」：若以印尼、斯里蘭卡與馬來西亞三國而言，可大概區分兩種對於中資的回應模式：其一，對中資抱持著與西方民主國家相近的不信任與質疑；其二，全力擁抱中國投資且未有懷疑。若再將各國媒體自由和民主化程度納入考量，則可發現：在民主程度較高、新聞媒體較為自由的國家，對於中資具有較為強烈的反彈與不信任。根據前文各國對中國對外投資回應的描述上，本文根據澳洲、德國、印尼、斯里蘭卡與馬來西亞等國在中國投資回應上的差異，歸納出政體差異可能是影響對中資「不信任」態度的假設，意即民主化程度高的國家，較不信任中國的投資，並會觀察到較多的民間質疑和政府的投資管制作為；反之，政體與中國較為接近的國家，此類現象相對較少。藉由釐清被投資國對於中資的信任與否，進而提出判斷中資往南是為在合作或是掠奪的判斷標準。在進一步探討適合此假設的研究設計前，將先簡述關於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與切入點，進而提出本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對既有文獻的貢獻。

參、文獻回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與貢獻

中國身為冷戰後崛起的威權與經濟強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已有若干程度的實證研究，於研究問題上則著重於以下幾個問題：第

¹¹ 相對於多已經是民主政體的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在政治體制上有較大的體制差異，更適合作為本文分析的標的。

一，中國的對外FDI是否由不同於文獻中的變因所主導？第二，中國投資是否集中於非洲與產油國家？但學者並未於決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因上達成一致共識。

Cheung和Qian（2009）指出，自1999年後，雖然中國已取代已開發國家成為對開發中國家的最大投資國，並於2005年後，在亞洲地區的投資逐步取代在非洲地區的比重，雖然中國對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投資策略不盡相同，但是並未發現統計上的證據支持中國投資著重於非洲與產油國的假說，換句話說，該文不認為中國對外投資屬於對開發中國家的資源掠奪。此外，在分析中國投資的因素時，Cheung和Qian在解釋西方國家對外投資的變數上，發現與文獻上一致性的結果，意即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與西方等已開發國家無異。而Van Grieken和Kantorowicz（2019）在分析了中國2000年到2014年的對外投資後，也並未發現中國利用其經濟實力去強迫太平洋各國的外交偏好，同時也無證據顯示中國致力於線他國於政務危機之投資偏好，進而間接否定了中資往南是「南向掠奪」的說法。另一方面，Morck, Yeung and Zhao（2008）、Buckley et al.（2010）、Chou, Chen and Mai（2011）等學者則持相反意見，Buckley et al.（2010）認為，中國的對外投資因受國家控制的銀行放貸系統、政府政策及國營企業所主導，其投資目的與傳統上對於跨國企業最大化公司利益的假設有所出入，使得傳統FDI理論無法解釋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的決策模式；在統計的結果上，Buckley等人也發現中國的對外投資有能源攫取（resources-seeking）的傾向。最後則是來自於已開發國家的跨國企業除了自身的經濟利潤外，也常帶來經濟自由化的外溢效果，惟中國投資因為國家主導的經濟政策，並未在被投資國帶來類似經濟自由化的外溢效果。Morck, Yeung and Zhao（2008）指出雖然中國的對外投資目前備受國際各界矚目，且多以東南亞諸國為主要投資對象，但就中國整體的經濟規模而言，其對外投資的總量上仍屬偏少。在投資策略上，因其政府政策與國有企業主導的投資，主要投資於能源與基礎建設產業。在此一政策導向下，中國的對外投資傾向於建立符合北京指示的指標性產業，而非高投資報酬的計畫，如此一來將使建立於廠商最大化投資利益前提下的國際投資理論，不適用於解釋中國對外的投資策略。綜合上述文獻可知過去的實證研究資料多停留在2010年前，亦即未將2013年以

後，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爆炸性提升的時間軸納入考量，並且多以中國投資的動機與決策模式為主要的研究客體。惟文獻的重點多為以中國投資作為依變數，探討中國對外投資的動機；與此相較，本文所關注之被投資國對中資的主觀感受，則與文獻中研究有所不同。

探討被投資國對中資的態度，則是文獻中的另一個較少被討論的切入點。部分學者（例如：Meunier, Burgoon and Jacoby 2014；Meunier 2014；Tingley et al. 2015）有研究關於已開發國家如何回應中國投資，例如Tingley et al. (2015) 分析美國國內對於中國於美國境內的企業收購與合併（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的反彈程度，透過以每一筆投資為分析單位的研究，他們發現被併購的產業如果屬於具有高度安全敏感性（security sensitive）或是經濟困難（economically distressed）的產業，則美國國內民衆反對來自中國企業的併購的機率也較高。在聚焦已開發國家外，部分文獻則以在非洲等開發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為研究主體（例如：Xiaoyang 2016；Sautman and Hairong 2016），分析中國投資對當地勞動權利、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帶來的影響，但仍多僅討論中國投資對當地國家的影響，而尚未直接涉及被投資國對於中資的政策回應，換句話說，本文以體制差異做為影響被投資國偏好的相關研究則尚未有相關文獻予以討論。

除了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及補充既有中國對外投資文獻之不足外，本文也將從以下兩個層面，對當代中國與國際關係研究有所貢獻：首先，這篇文章將可對中國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提供不同且重要的切入點。在安全與文化外，國內與國際之經濟活動與成果，是目前中國政府和北京共識的重要特色之一，故從經濟投資與互賴層次解釋各國對於中國的態度與信任，可更全面地提供對鄰近各國之於中國政策回應的分析。其次，則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將探索並提供各國對中國投資管制的初步架構，使未來研究能更為系統性地測量各國對中國投資的政策回應程度。一方面目前在文獻上，有關各國對於中國霸權與投資回應方式的討論尚顯不足，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對於建構系統性測量各國回應的研究也仍較為少見。綜合上述本文對於文獻、理論與方法上的貢獻，以下將概述研究方法上的選擇，包含國家個案的選擇條件與資料取得所面臨的困難。

肆、研究方法：比較個案研究法

本文的研究問題為解釋東南亞各國對於來自中國投資的政策與民間回應的差異，為什麼有些國家願意接受來自威權中國的投資，而其他國家則各方對此有所質疑與挑戰？在此觀察與研究問題之上，進一步提出政體差異作為初步解釋的假說。另外，部分學者（例如：Cheung and Qian 2009; Morck, Yeung and Zhao 2008）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已經由2000年代的非洲各國轉移到東南亞等鄰國，是故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東南亞地區的影響，特別是各被投資國如何回應來自中國的金流，則可以進一步呼應關於中國對外經濟影響力的最新趨勢。

研究方法上，除了提出的政體做為主要解釋變數外，尚有其他也可能同樣影響各國對中國投資態度的變數，例如中國在該國的投資總額、投資項目的產業別、總體雙邊關係、甚至是其他常見變數無法衡量的國別和時間別差異。¹²基於本文之初探性質的目的，將採小樣本但是強調解釋力的比較個案研究法，以探索合適的答案。在此研究方法選擇上，依照Gerring（2006）對個案研究的分類，對照東協各國變異量和個案選擇數目而言，本文將進一步透過最相似個案研究法（Most Similar Case Study），分別透過國家之間比較和時間前後

¹² 基於（一）樣本數大小和（二）資料取得與建構難易度，本文認為大樣本迴歸分析並不適合於目前階段的研究。首先，以東南亞國家協會（以下將簡稱東協）目前只有十個國家，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縮寫UNCTAD）提供的中國雙邊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料僅涵蓋2002年到2012年，這一方面無法提供可充分分析的樣本數，另一方面則是無法涵蓋到近五六年中國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在2015年後的直接對外投資總額，顯然與前期無法相提並論；相對於聯合國的雙邊投資資料，由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提供的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則是另一個學界常用於分析中國雙邊對外投資的資料庫，其中提供了2005年到2018年每筆關於中國投資的數據資料，但是即便如此，樣本數最多仍將小於150。基於樣本數與資料結構的考量，大樣本分析的回歸分析研究方法將不適合目前以東協各國為範圍的研究。除了樣本數的考量外，第二個研究方法選擇上的考量是資料取得與建構難易度，目前各國對於中國投資的回應目前缺乏一致且系統性的歸納結果，且各國的外國投資審理單位的年度報告多仍以當地語言為主，多只在網路上提供2015年之後的報告，例如泰國的年度投審報告僅有泰文，換句話說，要從零開始歸納一個系統性東協各國對中國投資的回應方式，以測量各國對其的「不信任」程度實則工程浩大且費時，並非本文預計投資之深度。

的對照，以提供粗淺的實證結果來支持提出：當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與中國較為接近時，該國對於來自中國的投資會有比較多的信任。關於詳細的個案選擇標準將稍後從自變數與控制變數的選擇上解釋之。在這研究設計的大框架下，以下將進一步詳細討論如何建構各國對中國投資信任程度的依變數。

一、依變數：如何測量各國對中國資金的「信任」與否？

本文主要的解釋變數為東協各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態度上差異，但是一方面基於很多中方投資都尚在進行中，無法直接如同文獻回顧中所提到的方式，直接分析中國在非洲的直接投資對當地在各層面直接帶來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除了透過直接的問卷或是田野調查外，無法直接測量國與國之間所謂的「信任」程度，所以本文將從以下兩個方向來衡量該國對於中國投資信任程度的代理變數：（一）各國對中國投資的核准狀況；（二）該國國內政治人物與民衆對中資再審議的要求。

就第一個方向而言，除了我國針對中資來臺的種種專屬限制外，一般來說一國政府鮮少對特定國家的投資有所針對性的管制，所以較難直接從外國投資管制的角度去建立各國對於中資的態度，而文獻中（Meunier, Burgoon and Jacoby 2014；Meunier 2014）提到關於歐盟各國對於中資的回應便僅呈現歐盟整體和各國對於所有外資的管制程度，而沒有提到歐盟各國是否對中資有特別的管制辦法。另一方面，在一國如何管理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例如：Golub 2003；Pandya 2014; 2016）則是以特定國家投資審查局，對於外資審查意見之內容逐條討論與分類，再佐以各國投資通過的狀況，來判斷該國是否對特定國家的投資有所偏好或是管制的狀況。換言之，如果特定國家對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有較為嚴格的審查標準、較長的審查時間、更多的擔保或是更低的通過率，則可以認為該國對於中資有所管制。而若對於外國投資的現象僅存在於國別而非產業別之上，也就上述的管制狀況僅存在於來自中國與其他國家像是日本、南韓的投資之間，而不是在不同產業（例如：農業、礦業、能源、基礎建設等等）的外國投資上，則更能進一步將所觀察到的管制措施視為針對中國投資的一種「不信任」的回應方式。這方面的資料來源，將依賴東協各國內部的外國投資審查局的資料與年度報告。

再回到有關於澳洲對中國投資的各類回應方式，來自民間與媒體對中資的異議是澳洲整體質疑中國投資不可或缺的一環，同樣的狀況也可以在印尼民衆針對中國投資的反應中發現。另外一方面，與政府做出實際政策或是管制措施所需要的時間和門檻相比，政治人物、民衆與媒體對於特定事件的異議、不滿或是抗議則較有時效性且容易發生，所以在時效性的考量上，也就是中國是在近三到四年內才對東協各國有顯著的大幅投資額度，本文認為從民間回應的角度出發，出以一國國內政治人物與民衆要求重新審查中國投資或是有反對中國投資的抗議、示威狀況，可合理的做爲第二個針對中國投資的一種「不信任」的回應之切入點。但同時也因爲政治人物、民衆與媒體對於特定事件提出異議的成本，相較於政府做出實際政策來的低，全面性地納入該國國內各種抗議或是異議聲音將可能導致較實際狀況爲誇大的狀況，所以本文將第二個切入層面的觀察限縮在以下的狀況：首先是該國的異議或是抗議必須是特定於來自中國的投資，像是澳洲民衆在房地產和農地上譴責來自中國的投資，而非全面性的反中狀況，例如早年興盛於東南亞各的的排華狀況；再者，抗議事件必須是在自中國投資在該地造成實際損害之前發生，像是印尼在近日大選前在野黨要求重新審視中國投資的高鐵一案，換句話說，對中國投資的抗議事件如果已經對當地造成實際損害，例如斯里蘭卡的百年港口租借爭議後，本文將無法區分導致該抗議的原因是因爲對於中資的不信任還是已經造成的實際損害，所以不會將中資對被投資國已經造成實際損害發生後的抗議或是異議行爲納入考量。雖然各類事件資料庫（例如：Global Database of Events, Language, and Tone，縮寫GDELT和Integrate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縮寫ICEWS）已經將世界各地的新聞匯聚成資料庫，但是考量到每一筆可能的抗議事件所需要的資訊量與詳細程度，將需要透過可以直接取得新聞本文的資料蒐集方式以取得所需的相關資料，因此各類英文新聞資料庫（例如：Google News、Factiva）將會是第二種衡量各國在民間對中資回應與不信任程度的主要資料來源。

二、控制變數：最相似比較個案選擇的標準

在確認依變數的操作型定義與資料來源後，以下將從最相似比較個案選擇的角度討論主要自變數——民主化程度的差異——與其他控制變數（例如：有

無領土糾紛、有無中國投資、主要投資產業別與經濟發展程度)來建立能夠初步回答研究問題的個案選擇與研究設計。最相似比較個案研究法的邏輯與回歸分析相似,就是當其他可能影響的原因都被控制變數所考量時,便可以透過自變數間的不同去解釋依變數的差異,因此一個適合本研究方法的個案選擇必須在依變數、自變數與控制變數上符合以下條件:國家間除了主要自變數外,選擇其他可能影響依變數的原因並無差異的兩個或以上的國家,如此一來,便可以透過符合研究假設的主要自變數去解釋依變數。在這樣的實驗設計考量下,將先討論控制變數,以選擇可以依循上述研究方法的個案選擇,之後再討論主要解釋變數操作型定義與建構方法。

在個案比較研究方法上,控制變數是決定個案選擇與解釋力的關鍵。因為本文的研究問題為分析各國對於中國直接投資回應程度的差異,並以與中國的政治體制差異為主要解釋變數,對於政治體制以外其他可能影響各國對中資回應程度不同的原因加以控制,一方面排除依變數的變化量同時被這些原因影響的可能性,二方面將所需要探討的個案數目予以精簡。根據文獻回顧的討論,本文將分別從與中國有無領土糾紛、有無中國投資、中國投資主要產業別與經濟發展程度等四個方向,先以前三者為第一階段,凡符合其中一項者,先以刪去法在東協各國內選擇適合的個案。表1為前三項控制變數摘要之結果與因此而刪去之東協國家。

表1 東協各國與中國在領土衝突、有無投資與投資主要產業別相關之國家

	與中國有無領土衝突	有無中國投資	中國投資主要產業別
越南	有		
菲律賓	有		
汶萊		無中資	
新加坡			以金融服務等三級產業為主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首先,如果一個國家對中國已經有所不滿或是有領土糾紛,例如存在於菲律賓與越南的反中情緒,那麼即便觀察到該國對於中國投資有各種激烈的反

彈，也無法知道是因為已經存在的反中情緒或是政體差異所導致，未考慮這點而進行的個案選擇將可能導致的推論與結果的偏誤，如此一來越南與菲律賓也將從適合個案範圍內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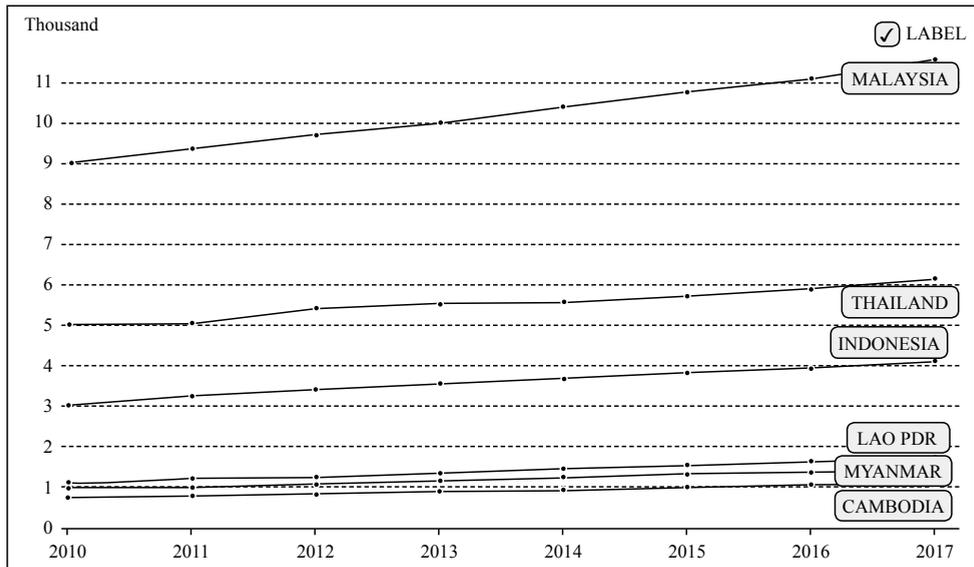
再者，更為直觀的控制變數則是有無中國投資，如果一個國家近年完全沒有來自中國的投資，以該國與其他有中國投資的國家比較國內對中資的回應，則同樣無法得知特定國家對中資有所反應是因為有無投資或是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信任。當然，在沒有來自中國投資的情形下，要觀察到有針對中資抗議或回應的機率也相對來的小。根據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資料庫，汶萊在近五年內完全沒有中國投資的，因此汶萊將會從個案中排除。更進一步來說，相對於以「有或是沒有」來自中國投資做為個案選擇的控制變數，以有「多少」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顯然為一個更全面的指標，只是基於本文採用的是小樣本比較個案分析，而非大樣本迴歸分析，因而很難定義出到底要「有多少來自中國的投資對被投資國來說才是夠多」這樣的標準來做為選取個案的判斷方式。基於上述之限制，故仍以「有無」來自中國投資做為本文研究方法的控制變數較為妥當。

接著，第三個控制變數是主要投資產業別。根據Tingley et al. (2015) 對於中國投資在美國遭遇反對意見的研究，投資產業別對一個國家是否對外國投資有所反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需要選擇有相同或相似來自中國直接投資產業的國家們做為研究個案。如此一來，新加坡便成為在這條件下被排除討論的國家，因為中國在新加坡的投資以金融產業和服務業為大宗，這顯然與其他國家著重於一級產業或是基礎建設相關工程有所不同。

最後，則是最重要的控制變數：經濟發展程度。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對於國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有所影響，雖然本文已經在第三個控制變數時，初步的在個案選擇中排除了主要投資產業別顯著不同的新加坡，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差異尚未被處理，所以要透過各國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將國家予以篩選，以建立符合最相似比較個案研究法的案例選擇。另外，再從被投資國的角度來看，如果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越低，相對於有高度發展的國家而言，前者對於來自中國的對外投資將會有較高的需求和較低的議價彈性，換言之，若將經濟發展程度相距懸殊的兩國一起比對時，雙方對於中資的議價彈性將有

可能同時影響到該國對於中資回應的方式與程度。人均所得是實務上測量經濟發展程度的常用指標，透過世界銀行的資料庫，本文將尚未被前三項控制變數排除的國家¹³（包含馬來西亞、泰國、寮國、印尼、緬甸和柬埔寨）顯示於圖1。根據圖1所示，可粗略的將剩餘的東協諸國依照人均所得程度分成三組：（一）馬來西亞、（二）印尼與泰國和（三）寮國、緬甸與柬埔寨。若從最相似比較個案研究法的個案選擇考量而言，在某種程度上，三個國家組即為控制各國經濟發展程度影響的個案選擇集群，換句話說，從比較同一個國家群組內，泰國與印尼對於中資的回應差異而得到的結論，相較於以泰國和柬埔寨等不同國家群組間做為對照組的推論，前者會比後者更有說服力且在推論上的謬誤會比較低。

圖1 2010年到2017年馬來西亞、泰國、寮國、印尼、緬甸和柬埔寨之實質人均所得



說明：單位為以2010年的美金為基準換算出來的實質人均所得（constant 2010 US\$）。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 (2019).

¹³ 已遭排除的國家分別有汶萊、菲律賓、越南與新加坡。

透過上述針對控制變數的討論，得知個案選擇可分別以（一）馬來西亞、（二）印尼與泰國和（三）寮國、緬甸與柬埔寨三個群組進行對於中資回應差異的比較。在此基礎之上，以下將進一步討論主要解釋變數操作型定義與建構方法，以便在最相似個案比較法的邏輯下，完成個案選擇的研究設計。根據前述對於各國對中國對外投資回應的描述上，本文根據各國在對中國投資回應上的差異，歸納出政體差異可能是影響對中資「不信任」態度原因的假設。

三、主要解釋變數：以民主差異解釋對中國投資的態度

首先，因為馬來西亞為第一個群組內唯一一個的國家，顯然無法與其他國家相互比較，但是馬來西亞在2018年中進行了獨立後的第一次政黨輪替，此舉被視為民主轉型的第一步，若能以2017年前與2017年後的馬來西亞相互比較，則能判斷是否有因為民主轉型的成功，而使馬國政府和民衆對於中國投資有相較於過去更多的疑慮和反對意見。但是基於篇幅考量，且部份馬來西亞的政體指標（例如政體IV資料庫）尚未更新至2018年，將缺乏部份判斷馬來西亞民主化程度的客觀標準，因此本文目前暫不將馬來西亞列入實證範疇。

接著，以下將分別透過兩個實證上最常用於測量民主化程度指標（自由之家與政體IV資料庫），分別來說明第二個群組（泰國與印尼）和第三個群組（寮國、緬甸與柬埔寨）在民主體制上的不同：自由之家為實務界最常用之民主化指標之一，其中泰國在2015年後便一直被評斷為不自由國家，而在2018年的新聞自由度指標上也被視為不自由的地區；在同一個時間點下，印尼則皆為部分自由國家，而在2018年的新聞自由度上則是被歸類為部分自由地區。因此透過自由之家的民主分類上，可以清楚的發現泰國與印尼分別在政治體制上屬於不同類別。政體IV資料庫為另一個實務上常用於判別民主化程度之資料庫¹⁴，該資料庫將各國的政治體制給予-10到10分的分類，而實證上的慣例是將6以上的國家視為民主政體。就2014年到2017年而言，泰國政體指標皆為-3，而印尼則皆是9，換句話說，不論是透過自由之家或是政體IV資料庫，在2014年之後，泰國的民主化程度皆遠低於印尼。而綜合兩個政體資料庫的

¹⁴ 詳見政體IV資料庫（Polity IV）。（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19）。

結果後，可以更加地肯定兩國在本文提出的主要自變數間的差異。

就第三個國家群組而言，緬甸不論是在自由之家的總評比和新聞自由上皆被視為部分自由地區，而在政體IV資料庫的政體指標為8，屬於民主國家；寮國則是不論哪一個指標皆判斷為不自由或是非民主地區；其自由之家指標和新聞自由皆被評為不自由國家，而政體IV指標為-7，更是毫無爭議的非民主國家；柬埔寨則在自由之家的總評比和新聞自由上皆被視為部分自由地區，但是卻在政體IV資料庫被視為-4的非民主國家，換句話說，對於柬埔寨的政體而言，並沒有一致性的分類結論。下表將上述兩群組各國在這三個指標上進行分類整理。

表2 泰國、印尼、柬埔寨、寮國、緬甸近年民主化程度之指標

	自由之家	新聞自由	政體IV
泰國	不自由	不自由	-3
印尼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9
柬埔寨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4
寮國	不自由	不自由	-7
緬甸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表2對於群組二與群組三內國家政體指標差異的總結而言，可知群組二（泰國與印尼）和群組三（寮國、緬甸與柬埔寨）相較，群組二的國家在所有指標，不論是自由之家總指標、新聞自由或是政體IV，皆在政治體制上相當大的不同，不論以哪個指標而言，都可以認為泰國的民主化程度低於印尼。與此相較，群組三的柬埔寨則在各指標上，不具有政體評比的一貫性。如此一來，群組二相對於群組三而言，群組二的國家在政體體制分類上，有較明顯且無爭議的分類，更適合用於最相似比較個案研究法，所以本文將以泰國與印尼的比較作為最終的個案選擇。

最後，基於中國的民主程度，不論透過那一個指標，從2015年甚至更早開始都是沒有變異量的不自由國家（自由之家）與非民主國家（政體IV資料

庫：-7），所以不需要額外計算東協各國與中國的政體差異，可以直接以上述各國的政治體制指標作為討論該國與中國間政治差異性的變數。

伍、國別對照：泰國Versus印度尼西亞

根據研究方法個案選擇的結果，本文將以泰國與印尼為對照組，分別就國家投資審查層面、國內民衆和政治人物的反應來分析假說：民主國家是否會因為政治體制上的差異，傾向於在各層面對於來自威權中國的投資有所異議，甚至是不信任？在上述直接資料證據外，筆者也以Pew民調和ICEWS等間接的數據進一步強化論述的可靠性。

一、印尼對中國投資的回應

關於印尼政府對於中資的回應，主要以印尼投資審查廳2016年第二、三、四季與2017年第一和第二季¹⁵共6份投資審查報告為主。根據上述投資審查報告，中國¹⁶對印尼每季平均約有14億美金的投資審查通過，2016年每季平均投資總額為13.14億美金，2017年的平均投資總額則為14.87億美金，乍看之下並無顯著成長或變化；另一方面，就審查通過之案件數而言，來自中國的投資案件數目由2016年每季平均785件投資案，在2017年提升到1027件，但是因為目前能取得的投審廳年度報告中，並未提供總申請投資案件數目與額度，也未於網站上提供每一筆投資審查通過的理由與審查期間等資訊，使得本文無法透過印尼投審廳的報告得知印尼政府是否對於中國的投資有不同的審查偏好或是不信任狀況。

雖然因為上述資料結構自身的問題，導致無法客觀的以數據判斷印尼政府是否優待中國投資，但是仍可從印尼政府對中國投資者的「支援」多寡判斷。

¹⁵ 其他幾年的報告僅有印尼文版本，資料取自印尼投資審查廳（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縮寫BKPM，英文為Indonesia Investment Coordinating Board）。（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 2019）。

¹⁶ 基於中英聯合等歷史文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本文將受一國兩制之香港直接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故將來自香港的投資與中資視為一體，一併計算之。

以中國在印尼美娜多（Manado）地區的投資為例，Bland（2017）在報導中提到中國投資者，因為土地取得、投資優惠減免等政策的關係，在發生當地居民發生抗議事件後，認為印尼政府很可能不選擇和中國投資者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不會繼續給予優惠措施，使得投資的風險增加，進而降低投意願。換句話說，印尼就政府層級而言，雖然未主動去「卡」中資，僅僅是消極的不配合被當地民眾反對，可能判斷為的「掠奪」中國投資項目。

但在印尼的民間層次而言，則可以清楚的在2019年4月的總統大選中，觀察到若干印尼民眾與在野黨政治人物匯聚了各方對於中國投資的不信任。例如大印尼運動黨的總統候選人普拉博沃蘇比（Prabowo Subianto），雖然不是一位反對經濟開放的政治人物，但是根據The Business Time（2019）的報導指出他認為所有來自中國的一帶一路投資都需要被重新檢視與檢討，以確保印尼人民的利益，這些大筆的中國投資很可能對於窮人和多數民眾沒有實質幫助，其中特別點名中資在Sulawesi島工業園區和爭議的首都高鐵皆已在印尼國內燃起對於中資的不信任和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恐慌；同時Lee and Yuniar（2019）則在報導中表示副總統候選人桑迪阿加烏諾（Sandiaga Uno）則進一步認為，印尼目前迫切需要更多外來的投資計畫與金援，特別是在基礎建設上，雖然中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先確保這些投資可以為印尼人民帶來高水準的就業機會和適當的生活水準，而非只是單純符合中國國家對外政策的投資計畫，這正好回應了本文提出從被投資國的主觀認知，進而判斷中資往南是為「合作」或是「掠奪」，又是為了誰的利益？

除了以最直接相關的反對中資的新聞顯示印尼國內對於中國投資的反對與不信任外，Pew Global Attitude計畫則提供另一個可以間接參考的指標¹⁷。根據Pew Global Attitude歷年的問卷顯示，印尼在2013年的報告中有70%的民眾對

¹⁷ Pew Global Attitude取自（Pew Research Center 2019）。該問卷的題目為一個國家民眾對於中國的偏好，包含了對於中國更層面的認知，例如人權、政府治理、軟實力等等，雖然中國投資在其中可能佔有很大一部分，但是絕非針對本文聚焦的中國對外投資，基於無特定理論支撐認為中國在印尼投資主導了印尼民眾對中國整體的偏好，所以筆者認為該資料只能用間接的佐證印尼國內的偏好與新聞所揭示的趨勢一致，而非揭示印尼民眾對於中資的直接偏好。

中國有正面的偏好，但是隨著中資往南、一帶一路計畫的開展，對中國有好感的比例逐年下降，至2019年有剩下36%；相對於對中國的好感度而言，在2013年僅有24%的人對持有負面的偏好，到了2019年該人數比例已經成長五成達36%，換句話說，與中資大舉往南之前相較，印尼國內對於中國的偏好皆一致的趨勢，而這剛好可以就上述新聞的例舉提供間接的證據。

綜合上述印尼政府與民衆對於中國投資回應的程度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發現。首先，在印尼政府如何回應中國投資的層面而言，基於印尼投審廳所提供資料結構的不完整，目前無法做出任何有意義的推論；但是在民間回應的角度上，在野黨總統候選人一方面將反中資的民意彙集於政見之內，另一方面卻僅質疑中資對於印尼可能帶來的利益是否充足，而不是全面否定來自於中國的投資。雖然在野黨的總統候選人並未贏得總統選舉，但是他的選舉政見與44.5%的得票率，仍顯示了印尼國內對於來自中國，特別是一帶一路下的投資，有所質疑與不信任。若從投資者的角度出發，也可以看到中國投資者對於。最後，Pew的民調數據從2013年到2019年的變化，則在進一步肯定印尼民衆對於中國日益增加的不滿與質疑，和稍早提到對於對湧入的中國投資的反彈有所一致。選舉的運作和媒體的報導自由無非都是民主政體的一部分，而筆者同時在相對於泰國兼具兩者的印尼，可以發現明確的不信任中資情況，依照本文提出的理論建構，則可以進一步推論印尼民衆認為中資掠奪大於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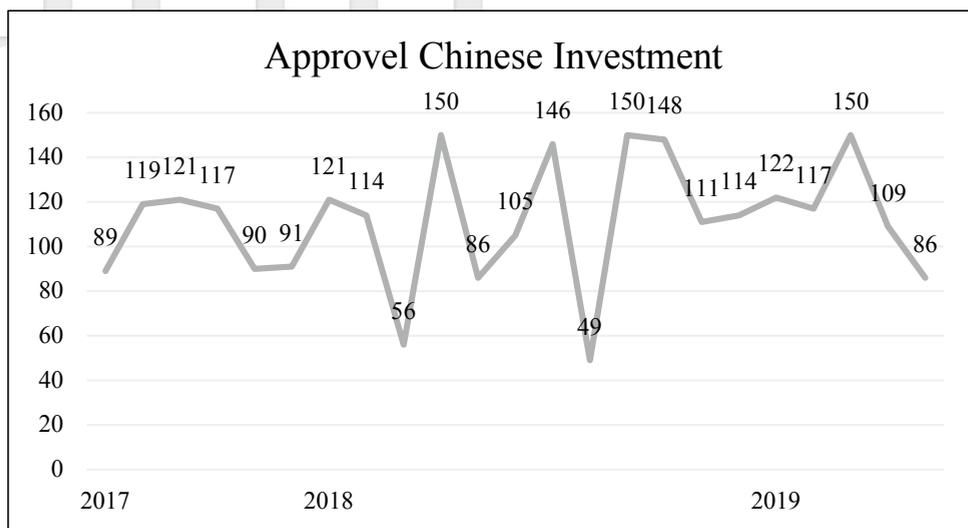
二、泰國對中國投資的回應

泰國與印尼的狀況類似，泰國政府也有設立投資審查委員會（The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縮寫BOI），負責提供審查外國投資是否符合泰國的要求與利益，其中該機構的網站上提供了2017年7月開始到2019年5月為止所有通過審查之投資案¹⁸，將來自中國投資的申請案件數以月為單位做計算則可以得到圖2¹⁹。

¹⁸ 關於泰國BOI的Promoted Company Database詳情可見（The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2019）。

¹⁹ 對於中國在泰國的投資上，本文採與印尼一致的標準，即將來自香港的投資與中資視為一體，一併計算之。

圖2 2017年7月到2019年5月泰國BOI審查通過之中國投資案件數



說明：作者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取自泰國BOI Promoted Company Database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2019)。

透過上圖，可知中國在泰國的投資案件總數，在形式上呈現一個相對穩定的趨勢。但是即便泰國政府提供了每個申請案件的資料，包含廠商名稱、產業別與資金來源國，而非如同印尼僅給加總後的國別訊息，但仍然面臨與印尼投資審查廳的資料相似的問題，一方面因為缺乏全部申請案件的數目，因此無法知道這上升的趨勢是因為泰國放寬對中國的投資審查標準，還是單純因為有更多的中國廠商前往泰國申請投資；另一方面則是多數報告僅只有泰文版本，因語言限制無法進一步探討是否有其他相關之報告。因此在泰國政府對於中國投資的回應上面，和前文對於印尼官方回應的結論一致：無法透過政府投資審查單位的年度報告或是統計資料，來判斷該國對於中國的投資是否有正面或負面的回應，進而無法知曉該國是否信任或質疑來自中國的投資。

在既有客觀的審投資料無法解釋之餘，本文仍從新聞報導中找到泰國政府優待中國投資的蛛絲馬跡。Parameswaran (2014) 在報導中指出泰國軍政府在

2014年取得政權後，總理巴育·占奧差（Prayuth）便轉向中國，希望中資能對泰國的基礎建設與農業發展有所投資，特別是在因為政變而導致來自美國和歐盟的資經與援助相較於前幾年有所短缺的狀況；近年來，Wengkiat（2018）在報導中指出泰國政府近日更提出Thailand 4.0計畫來吸引中資，特別針對一帶一路的相關投資，甚至提出以優惠於其他國家的利率和投資審查程序作為吸引中國投資。報導中更指出泰國政體的影響：因為泰國軍政府可以幫助中國投資者省略的審查時間、對環境評估、甚至是和地方民衆的洽談，中國投資者並不在意泰國軍政府是否進行獨裁統治。

相對於上述泰國軍政府對於中國投資大舉歡迎，泰國作為「沒有」或是「較少」相對於印尼國內層次對於中國投資的質疑與不信任，則相對較難呈現足以支撐本文假說之證據。不過，本文確實在但仍有部分地方政府與當地廠商，對中國投資的執行與法令可行性層面上提出與中央政府相左的聲音（Green 2019），也有部份民衆對中國礦業開始投資的計畫予以抗議和反對（Villadiego 2019）。在報導中，Villadiego引述泰國Mahidol大學的中國研究學者Puntarigivat的意見，指出中國企業利用官員的貪污，在各類投資項目上大作掠奪之實，中飽私囊，完全沒有將利潤分享給泰國民衆與社會，和官方宣稱的南向合作大相逕庭。換句話說，很可能不是泰國民衆高舉雙手歡迎中國投資，而是因為反對的意見都被泰國軍政府所壓制，無法透過類似印尼的民主機制所反應在選舉或是被全國所關注，致使在透過Google News使用英文關鍵字以2014到2018為範圍進行搜尋²⁰，並未觀察到類似印尼民間「不信任」中資的言論，也未看到中資因此而撤退或相關反應。

若以全國民調而言，相對於印尼，Pew在2014年後便不曾於泰國進行關於中國偏好的問卷調查，以至於更加難以呈現和印尼對於中國投資的對照比較。是以筆者假ICEWS的衝突資料²¹，參照Huang, Lein and Xiang（2019）對於不

²⁰ 搜尋中關鍵字以Thailand和China為主，再輔以protest, against, oppose等與反對相關字彙，最後以人力判斷是否為泰國國內反對中國投資相關的新聞報導。雖然筆者只採用英文關鍵字與英文報導，但是仍涵蓋了泰國國內與地區的大型報紙與新聞社，應足以反應泰國國內對於中國投資的一定程度以上的主流輿論。

²¹ 如前所述，以新聞事件資料庫還原特定國內抗爭或是有特定對象的運動時，其精準程

滿意程度的建構方式，以甲國對乙國發起的衝突加總作為衡量甲國對乙國的不滿程度，換句話說，衝突的數字越大意味著兩國民眾對於中國的不滿越高，藉此探討兩國民眾在中資大舉進入後，對於中國不滿的程度變化²²。整理資料後本文發現在2013年到2018年間，泰國對中國的平均衝突加總為6.925，同一時期印尼加總則為12.5，是泰國數字的一倍，由此可見泰國民眾對於中國不滿意程度遠低於印尼。

如果將上述泰國民間對於中資的異議程度與印尼相對照，則可以清楚發現泰國在面對中國投資，雖然國內民眾不全然和泰國軍政府的立場一致地歡迎中資，但是就（一）政府對中國投資者的優惠程度和（二）國內民間論述層級與聲量兩點。若就政府優惠政策與支援而言，雖然投審局可取得的資料無法顯示，但是從新聞報導可知印尼政府，在配合中國投資者徵收土地、提供優惠稅率、甚至是協商地方聲音上，並不積極配合。相對於此，泰國軍政府則是深獲中國投資者的信賴，不僅提供優於他國的招商專案和程序，也在處理土地、環境等等議題上備受中資肯定與青睞。是以若從政府層次出發，泰國獨裁的軍政府也顯然比印尼的民選政府，更能夠無視地方對於中國投資的異議，選擇大力優待且支援中資項目。

相對於印尼而言，泰國現行的獨裁政治體制在形塑泰國對於中國投資的主觀偏好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第一點的論述層級和聲量而言，雖然獨裁政權下的媒體自由程度可能導致對中資不信任輿論較難以形成，但是檢討與批評中資的意見並未如同印尼大選一樣，成為2019年泰國國會大選所討論的焦點。

度仍有待加強，所以筆者僅以此資料庫做為輔助用對照泰國與印尼國內民眾對於中國的態度，而非藉此建立測量兩國民眾對於中國投資的不信任指標。

²² ICEWS事件資料庫提供欄位分辨每一個事件的行為者，本文首先瀏覽所有中太和中印關係中由資料庫提供行為者類別（source sectors），並保留以下與民眾較為相關的行為者：「Agricultural, Social」、「Business, Social」、「Dissident, Protestors / Popular Opposition / Mobs」、「Dissident, Rebel」、「Education, Social」、「General Population / Civilian / Social, Social」、「Legal, Social」、「Media, Social」、「Protestors / Popular Opposition / Mobs, Dissident」、「Social, Education」、「Social, General Population / Civilian / Social」和「Social, Media」，之後在分別就印尼和泰國予以加總各事件的分數並計算2013年到2018年的平均衝突，為了解釋的方便，筆者已經將原資料中數據中正負轉換，以方便解決，即數字越大代表該國對於中國發起越多的衝突。

在印尼對於中資的反應已經民主政治和選舉，有著一定程度的匯聚，而非零星的反對與抗議；另一方面則可以看出對於中資「不信任」的意見，與印尼在野黨總統候選人要求重新檢視一帶一路的主張，兩者具有一致性的存在；投資泰國對於中資的反彈則多停留在執行層面上，而非所謂對於中國投資內容或是條約透明化程度有所不信任。最後再佐以ICEWS事件資料庫的間接證據，則可再進一步肯定泰國對於中資的不信任程度遠低於印尼。

陸、結論

在觀察到中國湧入世界各國的紅色資金時，各國有不同的反應，但是中資並未對被投資國產生預期的傷害時，為什麼仍可觀察到對中資的質疑，甚至是不信任的現象呢？本文以東協各國對於中國投資的回應方式，從主觀的角度去探討中國往南的投資究竟是被解讀為互利共生的合作、挹注開發資金？抑或是和過去中國在非洲的投資一樣，被認為是資源掠奪與市場強占？透過最相近比較個案研究法，以印尼和泰國為個案，結合威權擴散理論之研究基礎，提出政治體制差異的假說，就國家投資審查層面與國內民衆和政治人物的反應來分析假說。

透過印尼和泰國的對照分析，政治體制確實會在兩個主要的方向上影響一國對於中資的反對意見與不信任程度：第一個是政府是否有優惠或是不是利於中資的特別政策？基於資料取得的考量，本文無法透過兩國投資審查局的數據資料進行分析，但是仍可以從新聞報導中，從中國投資者對於兩國的信心和外來投資風險的評估，可以發現民選的印尼政府對於中國投資提供行政支援和協商的程度不如獨裁的泰國軍政府；另一方面則是民主政體同時提供匯聚並放大國內反對意見的機制，定期的選舉則提供監督與制衡政府的作用，因而僅能在印尼的個案中，透過新聞報導觀察到對於印尼民衆對於中國投資的不信任。除了上述兩主要層面，本文也分別以Pew民調和ICEWS事件資料庫分別提供兩國民衆，在中資湧入後對於中國的總體偏好，說明本文所使用之新聞資料的證據和客觀數據資料的方向一致，以降低因為不熟悉當地語言而可能導致的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

在最相似比較個案的研究設計下，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響一國對於中資偏好的其他變數，例如有無領土糾紛、有無中國投資、主要投資產業別與經濟發展程度，提出政體不信任的假說，並以政府與民間層次的資料分別對照印尼和泰國對於來自中國投資的偏好，分析對照後可知中國的投資在相對民主的國家比較容易被視為「掠奪」而非所宣稱的「合作」。

在研究方法和粗淺的實證探索下，本文期待能從以下數個方面補足既有文獻之不足：首先是針對FDI的文獻而言，探討被投資國對於外資的管制態度與回應方式，以提供中國於亞太地區投資所造成影響的未來分析方向，可更全面地提供對鄰近各國對中國政策回應的分析；另一方面則是探討東南亞各國對於來自中國投資的主觀認知，這將有助於分析介於美中兩強間，中小各國在金融上的取捨，預期會對中國崛起與鄰近地區互動的文獻有所貢獻。其次，本文則可以從被投資者的偏好出發，判斷威權是否透過對外投資而擴散，提供威權擴散文獻更為客觀的分析指標。

資料取得是未來相關研究可以進行突破的一個主要面向，例如向各國政府索取更完整的投資申請案件的資料以及審查意見，以便在政府回應層面上準確分析是否有對中資的特別待遇或偏見；另外一方面則是透過具有實驗設計問卷和深度訪談，更進一步取得東協各國實際對於中國投資的意見和態度。基於初探性質，本文並未深究民主的不同層面是否會對被投資國的不信任程度有所影響，而僅以民主政體統籌概括討論，特別是有關於東南亞各國國內政治勢力是否以攻擊或是擁抱中資作為其政治角力點，雖然並非本文的研究重點，但是不失為一重要的未來研究切入點。最後則是本文的推論係建立於最相似比較個案的設計下，並未窮盡所有可能影響一國對中資偏好的因素於個案選擇中，所以在推論上有所限制：本文只能就所提的四個控制變數下，提供不同政治政體可能會導致一國對於中資不信任與否的推論，因此擴大樣本國家和納入更完整的變數於研究設計之中，將會是可以突破本文研究限制的未來發展方向。

（收件：108年9月10日，接受：109年3月23日）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r Exploitation? Examining Distrust to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 ASEAN Countries

Wei-hao Hua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Whil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lows from China to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me recipients have shown their fear and question toward China's investment. For instance, European countries are afraid of the degradation of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 after embracing investment from China to their industries;, while Australia's public and media blame China's investment on real estate for the rising housing price. However, after carefully reviewing discussions on each case in the literature, it can be seen that China's investment neither brought autocratic propaganda nor a degrading situation to those countries. Put differently, China's investment is more similar as the scapegoat than sources of proclaimed damage to the society. As a result, it is puzzling to observe why countries do not trust China's investment but rather are treating it as the scapegoat?

In this paper, I will propose regim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invested countries as a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e observed distrust. Owing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mes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autocracy promotion, it is more likely for us to observe higher degree of distrust and doubt about investments from China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Following the official direction of the Belt-Road Initiative, I will focus on two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 Indonesia and Thailand --- and compare their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and civil response to China's investment. While holding similar factors, the article provides regime difference to explain why some countries "distrus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ut not others.

Keywords: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gime Difference,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 Domestic Response, ASEAN Countries

參考文獻

-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問題與研究》，36 (2)：1-32. Wu, Yu-Shan. 1997. “Kànghéng huò hùcóng: Miàn duì qiáng lín shí de cèlùè juézé”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Strategic Choices in the Face of Strong Neighbors]. *Wenti Yu Yanjiu*, 36 (2): 5-38.
- Acharya, Amitav. 2014. “Power Shift or Paradigm Shift? China’s Rise and Asia’s Emerging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1): 158-173.
- Alden, Chris, Daniel Large, and 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 2008. *China Returns to Africa: A Rising Power and a Continent Embrace*. London, UK: Hurst.
- Ambrosio, Thomas. 2012. “The Rise of the ‘China Model’ and ‘Beijing Consensus’: Evidence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18 (4): 381-399.
- 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 2019. “Statisti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ttps://www.bkpm.go.id/en/statistic/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 (June 12, 2019).
- Bader, Julia. 2015a. “China, Autocratic Patr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 as a Factor in Autocratic Surviv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9 (1): 23-33.
- Bader, Julia. 2015b. “Propping up Dictator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om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Authoritarian Persistence in Party and non-party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4 (4): 655-672.
- Bayuni, Endy M. 2019. “Democracy Shields Indonesia from Belt and Road Fallout.”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9/06/10/democracy-shields-indonesia-from-belt-and-road-fallout.html> (June 12, 2019).
- BBC. 2016. “Australia Blocks Ausgrid Energy Grid Sale to Chinese Companies.”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37129047> (June 12, 2019).
- BBC. 2017. “Sri Lanka Protest over Chinese Investment Turns Ugly.”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541673> (June 12, 2019).

- Beeson, Mark. 2009. "Hegemon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 (1): 95-112.
- Beeson, Mark, and Fujian Li. 2012. "Charmed or Alarmed? Reading China's Reg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 (73): 35-51.
- Bitzinger, A. Bitzinger. 2018. *The Aircraft Carrier: An Idea That Refuses to Die*.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Blackwill,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2015.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New York,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Bland, Ben. 2017. "Chinese Investors Hesitate over Indonesia Investment." <https://www.ft.com/content/bb1a9658-4517-11e7-8519-9f94ee97d996> (June 12, 2019).
- Börzel, Tanja A. 2015. "The Noble West and the Dirty Rest? Western Democracy Promoters and Illiberal Regional Powers." *Democratization*, 22 (3): 519-535.
- Brooks, Stephen G.,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12.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3): 7-51.
- Buckley, Peter J., Jeremy Clegg, Adam R Cross, Xin Liu, Hinrich Voss, and Ping Zheng. 2010.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Peter J. Buckley, 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pp. 81-118.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2019. "The Polity IV Project." <https://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June 12, 2019).
- Chazan, Guy. 2016. "Germany Withdraws Approval for Chinese Takeover of Tech Group." <https://www.ft.com/content/f1b3e52e-99b0-11e6-8f9b-70e3cabccfae> (June 12, 2019).
- Chazan, Yigal. 2017. "Australians Fret as Chinese Investment in Property Market Surges."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australians-fret-as-chinese-investment-in-property-market-surges/> (June 12, 2019).
- Chen, Dingding, and Katrin Kinzelbach. 2015.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China:

- Blocker or Bystander?" *Democratization*, 22 (3): 400-418.
- Cheung, Yin-Wong, and Xingwang Qian. 2009. "Empiric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4 (3): 312-341.
- Cheung, Yin-Wong, Jakob de Haan, Xingwang Qian, and Shu Yu. 2012.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 (2): 201-220.
- Chou, Kuang-Hann, Chien-Hsun Chen, and Chao-Cheng Mai. 2011. "The Impact of Third-country Effects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China's Outward FDI." *Economic Modelling*, 28 (5): 2154-2163.
- Chou, Mark, Chengxin Pan, and Avery Poole. 2017. "The Threat of Autocracy Diffusion in Consolidated Democracies? The Case of China, Singapore and Australia." *Contemporary Politics*, 23 (2): 175-194.
- Chung, Mona. 2017. "Why We Shouldn't Blame Chinese Buyers for Rising House Prices." <https://this.deakin.edu.au/society/why-we-shouldnt-blame-chinese-buyers-for-rising-house-prices> (June 12, 2019).
- Cogan, James. 2015. "Australian Media Promotes Right-wing, Anti-Chinese Protest." <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15/06/01/prot-j01.html> (June 12, 2019).
- Craig, Craig, Benjamin H. Friedman, Brendan Rittenhouse Green, Justin Logan, Stephen G. Brooks,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13. "Correspondence: Debating American Engagement: the Future of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8 (2): 181-192.
- Efird, Brian, Jacek Kugler, and Gaspare Genna. 2003. "From War to Integration: Generalizing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9 (4): 293-313.
- Fravel, M. Taylor. 2005.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 (2): 46-83.
- Fravel, M. Taylor. 2008. "Power Shifts and Escalation: Explaining China's Use of

- Force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 (3): 44-83.
- Freedom House. 2019.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freedom-world-2019> (June 12, 2019).
- Friedberg, Aaron L. 2011.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NY: WW Norton & Company.
- Gerring, John. 2006.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laser, Charles L. 2015.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 (4): 49-90.
- Golub, Stephen S. 2003. “Measures Of Restrictions on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or OECD Countries.” <https://doi.org/10.1787/335043060125> (June 12, 2019).
- Green, David. 2019. “Thailand Pushes China’s Belt and Road Despite Differing Visions.”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Belt-and-Road/Thailand-pushes-China-s-Belt-and-Road-despite-differing-visions> (June 12, 2019).
- Huang, Wei-Hao, Donald Lien, and Jun Xiang. 2019. “The Power Transition and the US Response to China’s Expanded Soft Power.” <https://doi.org/10.1093/irap/lcz008> (June 12, 2019).
- Jaipragas, Bhavan. 2017. “11 Projects that Show China’s Influence over Malaysia – and could Influence Its Election.”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2105440/11-projects-show-chinas-influence-over-malaysia-and-could> (June 12, 2019).
- Jennings, Peter. 2018. “Myth Busting Chinese Investment: Australia Can Say ‘No’.” <https://www.aspi.org.au/index.php/opinion/myth-busting-chinese-investment-australia-can-say-no> (June 12, 2019).
- Kang, David C. 2003.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7-85.
- Kang, David C. 2004.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 (3): 165-180.
- Kang, David C. 2007.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ennedy, Scott. 2010. “The Myth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 (65): 461-477.
- Kim, Inwook, and Soul Park. 2019. “Deterrence under Nuclear Asymmetry: THAAD and the Prospects for Missile Defens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40 (2): 165-192.
- Kuik, Cheng-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30 (2):159-185.
- Kuik, Cheng-Chwee. 2016. “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 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100): 500-514.
- Laurenceson, James. 2017. “Chinese Ownership of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Land.” <https://www.australiachinarelations.org/content/chinese-ownership-australian-agricultural-land> (June 12, 2019).
- Lee, Lynn, and Resty Woro Yuniar. 2019. “Review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 Indonesia Not Scapegoating China, Jokowi’s Opponent Says.” <https://www.scmp.com/week-asia/economics/article/3006043/prabowo-will-focus-chinese-investments-create-jobs-indonesians> (June 12, 2019).
- Lemke, Douglas, and Ronald L. Tammen. 2003.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9 (4): 269-271.
- Li, Xin, Kjeld Erik Brødsgaard, and Michael Jacobsen. 2010. “Redefining Beijing Consensus: Ten Economic Principles.”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 (3): 297-311.
- Malaysiakini. 2019. “Malaysia Hailed for Improved Press Freedom as World Democracies Flail.”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78815> (June 12, 2019).

- Mearsheimer, John J.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105 (690): 160-162.
- Meunier, Sophie. 2014. "'Beggars Can't Be Choosers': The European Crisis and 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36 (3): 283-302.
- Meunier, Sophie, Brian Burgoon, and Wade Jacoby. 2014. "The Politics of Host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Europe-An Introduction." *Asia Europe Journal*, 12 (1-2): 109-126.
- Moramudali, Umesh. 2019. "Is Sri Lanka Really a Victim of China's 'Debt Trap'?" <https://thedi diplomat.com/2019/05/is-sri-lanka-really-a-victim-of-chinas-debt-trap/> (June 12, 2019).
- Morck, Randall, Bernard Yeung, and Minyuan Zhao. 2008. "Perspectiv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9 (3): 337-350.
- Moss, Daniel. 2018. "Anti-China Tilt in Australia Is Shortsighted."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8-04-04/australian-rules-against-chinese-investment-are-shortsighted> (June 12, 2019).
- Pandya, Sonal S. 2014. "Democratiz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1970-20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8 (3): 475-488.
- Pandya, Sonal S. 2016.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lobalized Produc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 455-475.
- Parameswaran, Prashanth. 2014. "Thailand Turns to China." <https://thedi diplomat.com/2014/12/thailand-turns-to-china/> (June 12, 2019).
- Pedroletti, Brice. 2013. "When It Comes to China, Which Side Is Germany 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german-elections-blog-2013/2013/sep/12/china-which-side-is-germany-on> (November 13, 2019).
- Pew Research Center. 2019. "Spring 2019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https://www.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2019/09/FT_19.09.30_China_Topline.pdf

(November 28, 2019).

Posen, Barry R. 2014.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amo, Joshua Cooper.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UK: Foreign Policy Centre.

Rapkin, David, and William Thompson. 2003.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9 (4): 315-342.

Rasmussen, Anders Fogh. 2017. "China's Investment in Europe Overs Opportunities - and Threats." <https://www.ft.com/content/9e7428cc-c963-11e7-8536-d321d0d897a3> (November 13, 2019).

Ross, Robert S. 2006.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5 (3): 355-395.

Sautman, Barry, and Yan Hairong. 2016. "The Discourse of Racialization of Labour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9 (12): 2149-2168.

Segal, Gerald. 1996.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4): 107-135.

Smith, Geoffery. 2015. "Australia Just Stopped China Buying a Farm the Size of Kentucky" <http://fortune.com/2015/11/19/australia-just-stopped-china-buying-a-farm-the-size-of-kentucky/> (June 12, 2019).

Smyth, Jamie. 2018. "Australia to Tighten Foreign Investment Rules Amid China Concerns." <https://www.ft.com/content/308ca8d6-06f6-11e8-9650-9c0ad2d7c5b5> (June 12, 2019).

Tansey, Oisín. 2016. "The Problem with Autocracy Promotion." *Democratization*, 23 (1): 141-163.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of Thailand. 2019. "BOI: Promoted Company Database." https://www.boi.go.th/index.php?page=form_promoted_companies (June 12, 2019).

- The Business Times. 2019. "Indonesia Polls Thrust China's Belt and Road Push into the Spotlight."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government-economy/indonesia-polls-thrust-chinas-belt-and-road-push-into-the-spotlight> (June 12, 2019).
- The World Bank. 2019.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data.worldbank.org/> (June 12, 2019).
- Thiessen, Tamara. 2018. "The Growing Revolt against Chinese 'Conquering' French Farms." <https://www.scmp.com/print/news/world/europe/article/2163341/growing-revolt-against-chinese-conquering-french-farms> (June 12, 2019).
- Thompson, Drew. 2005.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From the 'Beijing Consensus' to Health Diplomacy." *China Brief*, 5 (21): 1-3.
- Tingley, Dustin, Christopher Xu, Adam Chilton, and Helen V. Milner.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ward FDI: Opposition to Chine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8 (1): 27-57.
- Van Grieken, B. Jurriaan, and Jaroslaw Kantorowicz. 2019. "Debunking Myths about China: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fficial Financing to the Pacific." *Geopolitics*. DOI: <https://doi.org/10.1080/14650045.2019.1654459> (June 12, 2019).
- Villadiego, Laura. 2019. "Thai Villagers Continue to Fight Chinese Plans for Potash Mine."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02973/thai-villagers-continue-fight-chinese-plans-potash-mine> (June 12, 2019).
- Walker, Christopher. 2018. "What Is 'Sharp Power'?" *Journal of Democracy*, 29 (3): 9-23.
- Walker, Christopher, and Jessica Ludwig. 2017. "Introduction: From Soft Power to Sharp Power." In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ed.,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pp. 8-25.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Weede, Erich. 2010. "The Capitalist Peace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6 (2): 206-213.

- Wengkiat, Paritta. 2018. "Thailand Woos Chinese Investment for Major Industrial Revamp."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10998-Thailand-woos-Chinese-investment-for-major-industrial-revamp> (June 12, 2019).
- Xiang, Jun, Chris B. Primiano, and Wei-hao Huang. 2015. "Aggressive or Peaceful Ris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a's Militarized Conflict, 1979-2010." *Peace Economics,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1 (3): 301-325.
- Xiaoyang, Tang. 2016. "Does Chinese Employment Benefit Africans? Investigating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ir Operations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16 (3-4): 107-128.
- Yakouchyk, Katsiaryna. 2019. "Beyond Autocracy Promotion: A Review."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17 (2): 147-160.